

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

(1)



山西省考古学会 合编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考古学会第一、二届年会纪要

(代前言)

山西省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和第一届年会于1984年12月23日到28日在太原晋祠宾馆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71人,来宾33人。提交大会的论文43篇。

成立大会得到省委和省政府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怀。省政协付主席陶健同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温幸同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贯文同志、副院长张海瀛同志,山西大学校长程人乾同志,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贾澜坡教授、北京大学考古系邹衡教授。省文化厅厅长曲润海同志,副厅长郭士星同志,省文物局局长贾立业同志、副局长张一同志,省历史学会、山西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乔志强同志光临大会并致词,勉励我省文物考古工作者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把文物、考古科研搞好,取得更大的成绩。刘贯文院长建议编写《山西考古丛书》,编集出版古代文化、经济等考古发掘材料。

大会收到了中国考古学会的贺词。

会议期间请古人类学家贾澜坡教授讲旧石器的考古调查研究。贾老要求不仅要发现新地点、还必须弄清来龙去脉,发掘工作要做得细致正确,文物要一点一滴的清理,做好文物的保护工作,在研究工作中要注意解决一万到二万年间古人类研究工作中的缺环,解决人类起源和分期问题。研究壁画、墓葬。建立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序列。在山西有两大系统:北部是北京猿人——许家窑人——寺峪人,使用的工具小巧为特点的小石器系统,狩猎业为主。南部由西侯度人——丁村人,使用生产工具大型石器,以采集经济为主。通过不断的工作、实践,发现新材料,填补环节,不断完善。希望山西同志共同努力,搞好山西的旧石器考古。外国人来山西很多,世界上都注意山西。山西这几年有些落后了,希望你们要加强研究、多出成果、多出人才,赶上先进水平。

邹衡教授讲了“我所理解的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到了”。列举了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省、特别是山西考古工作中新成就。研究夏文化全国有两个中心,一个就在山西,近年来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曲沃曲村都是研究夏文化遗迹的重要地点。晋文化关于叔虞封唐晋国始封地的研究,侯马晋国晚期都城新田、庙底遗址、上马基地的发掘,都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重大收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分别介绍了襄汾陶寺,垣曲古城的商城发掘工作。

向大会提供的43篇论文和报告述及的面很宽,有旧石器、新石器仰韶、龙山文化、商周、秦汉、北魏北齐、唐宋元明清各代考古研究成果。特别是张颉同志《竊斁方鼎铭文考释》论证了这件方鼎是殷王康丁二十年赏赐给他侄儿的遗物,可能是叔虞封唐建国之初,周天子赏赐给唐叔的重器。说明曲村遗址与“唐”地有联系。

大会最后通过了山西省考古学会章程，接受了会员，选举了理事28人，常务理事有张颌、王建、王克林、陶正刚、王向前、解希恭、张畅耕、李壮伟、水既生。张颌同志任理事长，王建、王克林同志任副理事长，陶正刚同志任秘书长。聘请刘贯文同志任名誉理事长、名誉理事有程人乾同志、王定南同志。

大会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代表会。

第二周年会于1986年12月20日——25日在山西大同云岗宾馆召开的，中心议题是北朝文化和北魏古都平城的研究。出席会议的代表有90人，来宾42人，提交大会的论文42篇。

大会得到省和大同市委、雁北地委各级领导的关怀和热情支持。政协副主席王定南同志专程到大同亲临指导，大同市委和雁市地区的领导到会致词，省文物局副局长李治国同志亲自安排会议。领导们特别关心北魏古都平城的研究和保护，精心安排了代表们参观大同云岗石窟，上下华岩寺，善化寺、九龙壁、平城古城址，浑源悬空寺、应县木塔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代表们向保养所学习管理经验，交流了工作，增加文化知识。

这次大会是在理事长张颌同志、副理事长王建同志的主持下召开的。会议期间内蒙文物考古研究所李逸有付所长介绍了内蒙考古新成就，详细论述了内蒙南部和山西古文化关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杜耀先同志介绍了北京考古新成果。雁北文物站站长张畅耕同志介绍了北魏古都平城的位置、历史沿革和研究成果，纠正了日本学者对平城研究中的不实之辞。水既生先生介绍了雁北古窑址和特点。还有许多同志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提要，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好评。学术讨论热烈又紧张，各抒己见，交流了思想和研究成果。会议自始至终空气活跃、欢快。

两次年会上代表们都十分踊跃地提交内容丰富、论点清楚、资料详实的论文。由于篇幅和经济拮据，只能编印选集，供代表们交流，活跃研究空气，推动我省考古事业蓬勃发展，达到新的高度。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地编印出论文集，提供给大家。不能说不是一个缺点。现在尽量地把两次年会所提供的论文都编印进来。一则留作纪念，一则鼓励大家奋勇向前，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1989年10月

目 录

山西省考古学会第一、二届年会纪要(代前言)

山西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王克林	(1)
山西旧石器时代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陈哲英	(17)
略论我国北方几处史前石器制造场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王向前	(35)
略论西侯度文化和匭河文化的关系	山西大学历史系	李壮伟	(39)
关于下川遗址和丁村遗址群7701地点的时代和性质问题——与安志敏先生讨论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王 建	(44)
山西省原平后口发现旧石器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丁建平等	(50)
昔阳县河上发现旧石器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陈哲英等	(58)
黄河龙门水库区考古调查报告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王向前等	(62)
汾河上游——静乐县新石器遗址调查	忻州地区文化局	郭俊卿	(66)
略论中国青铜器的起源	山西省文物局	张亚平	(71)
需孳方鼎铭考释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张 领	(75)
灵石商墓亚羌铭试析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陶正刚	(77)
略论我国古代的氏族部落联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侯 毅	(96)
晋阳宫城址浅探	太原市文管会	常一民	(102)
原平县练家岗战国青铜器	忻州地区文化局	李有成	(107)
略谈平阳布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朱 华	(110)
山西省又发现三孔布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朱 华	(114)
春秋山西北狄考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杨纯渊	(118)
无终、娄烦考	忻州地区文化局	贾志强	(123)
“吏准从军”试解——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札记	晋城市文化局	郭一峰	(133)
秦甌整量初考	运城地区文化局	张国维	(137)
朔县发现的匈奴、鲜卑遗物	朔县文化局	雷永贵、高士英	(140)
《水经注》平城如浑水疏证	雁北地区文物工作站	张杨耕	(148)
平城营造始末	大同市博物馆	张增光	(154)
云冈昙曜五窟的帝王象征		赵一德	(159)
山西襄汾县北魏正光二年造像碑	临汾地区文化局	解希恭、陶富海	(168)
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志铭注释	太原市文管会	王天祯	(173)
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壁画艺术——传统的民间艺术之花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陶正刚	(181)
试谈娄睿墓壁画的传统技法与风貌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高彤流	(187)

北齐《贺娄悦墓志铭》释考·····	太原市文管会	渠川福 (194)
武则天世家·····	文水县博物馆	梁恒唐 (199)
北宋魏闲墓志铭之发现与研究·····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戴遵德 (201)
应县木塔台基年代考·····	应县木塔文管所	张永权 (205)
山西襄汾县曲里村金元墓清理简报·····	临汾地区文化局	陶富海、解希恭 (208)
司马金龙墓的釉陶加彩俑在陶瓷技术发展中之意义 ·····	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	水既生 (214)
试论法化的命名·····	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	水既生 (215)
浑源窑的青地嵌白和白花褐地陶瓷·····	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	水既生 (218)
稷山、新绛金元墓杂剧砖雕研究·····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杨富斗 (220)
古冀氏县佛教遗址初考·····	安泽县图书馆	逯鼎艺 (232)
元好问及元好问墓·····	山西省博物馆	蔚润明 (234)
记新发现的无好问撰《徽公塔铭》·····	河南省龙门文物保管所	温玉成 (238)
河曲四方铜印辨·····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刘永生 (241)
山西昔阳的三方金、元铜官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昔阳县博物馆	杨纯渊 (258) 翟盛荣
朔县出土一批琉璃塑·····	朔县文化局	雷云贵 (260)
原平县土围子考察记·····	原平博物馆	薛补会 (267)
吕梁地区文物考古工作概述·····	吕梁地区文物工作室	杨绍舜 (272)
天镇北部长城的现状与历史考释·····	天镇县文管所	吴永春 (278)
傅山“菊花图赞”研究·····	运城地区河东博物馆	王泽庆 (286)
清长城——清长城的发现、确认及调查·····	临汾地区文化局 吉县文物工作站	(291)

山西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王克林

山西境内山川纵横，地形复杂，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北有管涔，南有中条，山峦起伏，构成许多丘陵和高原。西面黄河北来又折向东去，境内有汾、浍、涑、沁、漳、潞、桑干等大小河流，造就了定襄、太原、临汾、运城等许多大小河谷盆地或平原。这种较为理想的自然环境，为远古人类和文化的起源创造了条件。根据中外考古学家的有关人类和文化起源的论点，认为丘陵和山前地带往往是人类与文化起源的理想地域。所以，山西从遥远的古代起，就成为华夏文明的起源地。

建国以来，山西的考古工作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发现的古遗址和古墓葬，据不完全统计，数量已近四千处，这在国内是名列前茅的。就已经发现的文化遗存的时代性质看，有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夏文化、北方系青铜文化和晋文化，在我国考古学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考古发现和成就，为中国历史和山西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一、山西的考古收获与成就

我省的考古工作，从五十年代起，经省内外许多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的收获。现已发现从旧石器时代至宋金元时期的文化遗址和墓葬数以千计，其中有不少重大发现或成就闻名国内外，为学术界所瞩目。下面我们将就各个历史时期考古文化阶段的文化遗存，择其重点扼要给予介绍评价，简略地说明其学术意义。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

山西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据目前所知已有200余处。旧石器早期文化计有八处，重要的有距今170万年以前的芮城西侯度和六七十万年前的匭河以及垣曲南海峪、襄汾解村、万荣西桌子村等多处。在这些遗址或地点出土的旧石器，大多以大型三棱尖状器和石片石器为主。其中西侯度遗址是六十年代以来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它不仅文化年代早，是迄今我国最早的古人类遗存，而且文化丰富，除出土许多打制石器外，经考古学们的研究认定，在这里还发现有当时人类使用火的痕迹。西侯度遗址的发现，使得我国古人类的发展史提前了一个地质时代，为研究中国早期的石器时代文化和人类的起源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上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旧石器中期文化，在山西发现较多，分布的地区亦广。丁村旧石器文化的年代距今约二十万年，是建国后我国旧石器考古重要发现。这里发现了大批石器，以三棱尖状器

为主，次有石片、石球等。同时在其晚期发现了细石器。这里发现的人类化石有头骨残片和牙齿，并发现了许多脊椎动物化石。许家窑旧石器文化遗址，根据地层关系，时代属晚更新世，距今约十万年。出土人类化石头顶骨十块、牙齿六颗和枕骨等。伴随的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器，有石片、石核、尖状器、石球等；动物化石有鸵鸟、象、披毛犀、虎、野牛、野马、野猪等，均十分丰富。由石器看，多见小石器。考古学界有人认为许家窑文化别具一格，它的小石器可能和晚期细石器有其渊源关系。此外许家窑的人类化石，根据其体质特征，贾兰坡先生断定“许家窑人”是北京猿人的后代，对研究北京猿人的演化，是一项重要的资料。

山西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发现较多，是近年来我省旧石器考古的重要收获。不但发现的地点多，文化内涵丰富，而且还发现不少遗址和新的文化类型。例如吉县柿子滩、蒲县薛关、襄汾柴寺等地的旧石器地点，另外在襄汾沙女沟、太原古交两地发现的旧石器文化和石器制造场，在和顺、陵川发现了洞穴遗址，这类石器制造场和洞穴遗址在国内尚属少见。沙女沟石器制造场遗址，是一处大型石器制造场，面积达三万平方米，遗址文化堆积丰富，最厚处达4米。发现制作的石器有成品或半成品。石器的制法接近垂直打击，工艺定型、器形多见矛头或“投枪”类器、腰形手斧或舌形器等。若从此石器的形制去判断，其年代当超出旧石器的特征，具有早期新石器文化的作风。为此，我们初步推断沙女沟石器文化的年代可能为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过渡之前陶时期的文化，或者即为早期新石器时代，也不是不可能的。沙女沟石器制造场的发现，不仅给山西旧石器时代文化增添了一处新的文化类型，而且还可能对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新旧石器时代的划分、早期新石器文化的特点、内容等方面的研究，提供重要资料或线索。

山西典型的细石器文化遗址，八十年代初在吉县发现柿子滩遗址，据测定其年代在一万二千年左右，属考古学文化发展阶段的前陶文化时期。该遗址尚未正式发掘，但遗存丰富并非常重要，属典型的细石器，石器制作精细，系间接打击法，器形多见石核、石片、刮削器和椭圆形或菱形嵌状器。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山西细石器文化遗址较多，分布范围也很广阔。鉴于这类石器文化在我省延续的时间较长，从旧石器晚期一直到龙山文化时期，文化年代恰在晚期旧石器和新石器之间，因此探讨它的文化性质、时代和属性是非常有意义的。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石器与美洲印第安人使用的细石器有着相似之处。因此，目前学术界有不少同志认为，有关细石器的发生地点，可能源于亚洲大陆，首先可能发生于华北地区。所以，对细石器文化的研究，山西无疑是一个重要地区。对这类文化研究，不但可以探索细石器文化向外传播发展（或旧石器时代人类向外迁徙发展）和大陆地理变迁等情形，同时还可以探讨：在中国，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有无一个过渡的中石器时代的重大的学术课题。

山西的旧石器文化是丰富的，文化发展序列清楚，年代衔接，同时文化类型亦很复杂。有世界上年代最早之一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也有为数众多的晚期细石器。在年代学上已有一个清晰的从早到晚的文化序列。国内其它地区有如此清楚的旧石器文化序列也还是不多的。在文化内涵上，山西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还存在着许多类型，多种类型的存在可能与文化的发展或年代的早晚有关，或许是揭示了当时人类在生产、生活方式上有

所差别，抑或是它们所处地域不同的反映。这些都为我们研究旧石器时各方面的课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

1.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磁山类型。山西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即距今约七千年左右，相当于近邻陕西的老官台、河南裴李岗、河北磁山，为今考古学界所称的“前仰韶文化”。目前在我省还未发现老官台和裴李岗类型的文化，仅在晋东南太行山西麓的武乡县石门乡牛鼻子湾发现磁山类型文化的线索。1984年，我们曾在这里征集到石磨盘和石磨棒一件，石器的形制特征，与磁山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十分相似。虽然遗存不多，难以了解其文化的全貌，但却为我们探索山西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2. 仰韶文化。山西仰韶文化遗存分布较广，其文化面貌大致有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其文化特征是共性大于个性。其中半坡和庙底沟类型，遗址较多，分布很广，而大司空村类型，不但数量少，遗存也不丰富，它发现于太行山西麓的晋中和晋东南一带，而往往又多与前两个类型共存。关于山西仰韶文化的年代和文化发展的序列，就现有资料看，文化发展关系清楚，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时代连续，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仰韶文化早期遗存，以垣曲古城东关仰韶文化遗址为例，在这里发现的仰韶早期遗存，其文化内涵在遗迹方面，发现有房子、壕沟和灰坑窖穴。遗物以陶器为主，陶系有红陶、红褐陶、灰陶。纹饰主要有弦纹、附加堆纹、剔刺纹等。器形有红顶或灰顶的盆、钵、小口平底罐等。此外还发现不少陶铎。这是目前在山西唯一经正式发掘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存。

仰韶文化中期遗存。这一时期的仰韶文化在我省发现较多，分布范围也较广，遗存也很丰富。但在文化内涵上有所差异，即有半坡仰韶文化类型和庙底沟仰韶文化类型之分。下面我们仅介绍经正式发掘的永济（今芮城东庄村半坡类型和西王村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遗存。

东庄村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位于芮城西南16公里，仰韶文化堆积的面积为5万平方米，发现的建筑遗迹有房子两座，一座平面略呈圆形，直径1.7~1.9米，房基周围有柱洞，室内东北沿有小烧坑即火塘一个。另一座为口大底小的竖穴式房子，穴深1.8米，平面椭圆形，直径约5.4米，房子东南设斜坡门道，在室内东南角还有一个形制规整的袋状窖穴。此外，在遗址中发现许多椭圆形、袋形的灰坑或窖穴，不但数量多而且还很密集。在生产工具方面，种类不少，发现有石质和骨质的斧、刀、镑、镞、纺轮、网锤、弹丸、针、锥等。这些工具反映出这里仰韶文化居民的生产方式主要以农业为主，并兼营狩猎和渔猎。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陶系有泥质红陶、灰陶、夹砂红陶、灰陶四种。红陶多彩绘，花纹绘黑色的带纹、弧线、圆点纹等。其中以彩绘动物和鱼纹最引人注目，器形多见钵、盆、碗、瓶、罐、瓮。由于陶器的形制或花纹多与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相似，所以人们一般称之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仰韶文化中期的墓葬，在东庄村仅发现5座。形制有单人土坑葬、双人或多人合葬。其中有二座属于二次合葬墓，一座为2人，一座为9人合葬，据此说明东庄村仰韶

文化半坡类型的社会性质，亦是血缘关系密切的母系氏族社会。这是目前较能全面反映山西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典型遗址。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这类仰韶文化遗存在山西发现较多，典型的遗址有芮城西王、垣曲古城东关和夏县崔家河等。西王村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址，位于芮城县风陵渡东北1.5公里的黄河北岸。在所发掘的几百平方米范围之内，发现袋形、圆形、椭圆形多座灰坑建筑遗迹。文化遗物丰富，生产工具有砍砸器、刀、斧、铲、纺轮、网坠等石器。生活用具多为陶器，陶质以细泥红陶为主，次有夹砂红陶、灰陶。制法均为手制。纹饰多绳纹、附加堆纹。彩陶颜色有黑、红、白三种，间也发现有三种颜色配合使用。纹饰复杂，基本是由条纹、弧线纹、弧线三角纹、圆点纹和网纹等组成。器形有盆、钵、碗、罐、尖底瓶等。装饰品多陶环和骨笄。从生产工具所反映的山西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人们的经济生活，与半坡类型基本相似；但人们的生活方式、艺术爱好、氏族的图腾信仰等似有不同，前者（半坡类型）是以人们现实生活中动物鱼类为崇拜对象，而后者大概是以植物花卉为信仰的主题。因此，这两类仰韶文化在山西一隅共存，表现了他们氏族和血缘关系大概有所不同。这一考古现象的存在，对于我们研究仰韶文化氏族的发展或变裂，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仰韶文化晚期遗存。根据考古调查，山西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为数很多，分布很广泛。其文化特征，总的来说，遗存的类型大体与中原无别。生产工具主要还是以石、骨和陶质类制成，但在制作技术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与进步。同时还出现了蚌器。可能由于当时人们的注意力有所转移，因此彩陶的生产开始衰退，花纹简化，多见用红或粉白彩画斜线与波折纹，不见动物纹。器形除以往习见的盆、钵、碗等外，出现了新型的带流嘴的陶器。由此说明，仰韶文化晚期人们的生产水平有了提高。这时的社会形态，大概已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或许已转入了原始父系氏族社会。这个时期的典型遗址有芮城东王村仰韶晚期遗存等。

东王村遗址西北与仰韶中期西王遗址仅距三、四华里。遗址的面积，由于黄河的冲刷，仅剩下百余米的范围。然而文化遗存却是很重要的。这是一处时代单纯的仰韶晚期的村落遗址，发现的建筑遗迹有袋形灰坑。遗物有石斧、锛和蚌器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主要有陶器，多为砖红或桔黄的细泥陶、夹砂粗红陶，灰陶很少。器形也主要有盆、钵、碗等，但形制有了变化，与仰韶中期的同类器有所不同，同时出现了小口深腹平底瓶。

仰韶文化的类型与面貌，在我省的情况大体如此。但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类型的数量和分布上，大抵庙底沟型多于半坡型，而两者又多集中在晋西南一隅。从类型的分布看，便可说明这两型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这里的半坡类型，如果在年代上与庙底沟类型同时或相差无几的话，则它当不是这个地区的土著，而是从该类型中心地区陕西关中发展而来的。而庙底沟类型在我省数量众多，广泛分布，又多与这里仰韶早期文化有着一定的发展关系，从而说明庙底沟仰韶文化类型是这个地区的土著，其来源，可能就是从这里的早期仰韶文化发展而来。

3. 龙山文化。据考古调查，山西境内龙山文化分布广阔，数量不下千处。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或地域的不同，反映在文化面貌及内容上，有着明显的文化区系类型之分。

根据它们的地域和文化内涵的差异,大致分为滹沱河类型、晋中类型、晋南(塔儿山)类型和晋西南等几个龙山文化类型。下面,我们就将各类型龙山文化的特征与性质等,逐一简单地予以介绍,并扼要说明其学术意义。

(1)滹沱河类型。对这个龙山文化类型,以往我们还没有正式发掘过。根据考古调查所知,其文化内涵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如以定襄西社遗址为例,在这个遗址中采集到的石质生产工具有石球、盘状器、砍刮器等打制石器,磨制的石斧、镑等所占比例较少。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陶系有细泥灰陶、夹砂陶和泥质黑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习见鬲、甗、甗、罐、豆、碗等炊盛器,不见陶鼎,形制似与他处有一定的区别,故可暂视为一个龙山文化类型。然由一个遗址的器物作为整个滹沱河类型,目前尚嫌资料不足,尚有待于发掘更多滹沱河流域的龙山遗址去证实,并丰富其内容。

(2)晋中类型。这一类型的龙山文化近年来我们调查和发掘的遗址较多,其分布范围主要从我省太行山西麓,沿太原盆地周围吕梁山一线,并由此向西北一直延伸到内蒙古地区,其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太原义井、东太堡,太谷白燕,交城瓦窑堡,文水上贤和汾阳杏花村等处。

早期遗存。以义井和白燕为例。建筑遗存有窑洞式单室地穴和双室“吕”字形房子,斜坡台阶门道,室内多设壁龛和火塘烧灶,半地穴圆形土坑房子也有所发现,但不见石灰面房屋建筑。遗物中的生产工具,以石质的为多,有打制的盘状器、砍砸器、刮削器等,磨制的有石斧、镑、铲、刀、锥、针等。陶质的有刀、纺轮。骨质的有刀、镞、锥、针等,种类很多。蚌器不多。同时并有较多的细石器出土,器形有典型的石镞、扇形器、石核、石片等。这类石器是旧石器晚期的遗存,而今在龙山时期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仍被人们沿用。这说明制造这类石器的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的龙山时期,当是其地的土著居民。如果这一推测可信,那么这些山西古代人类,至少到龙山时期不是外来的,而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原始人类。

关于晋中龙山文化早期的生活用具,主要还是陶器,然而陶质复杂,计有灰、褐、红、白、黄、黑陶多种。纹饰多绳纹、篮纹、堆纹。并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形以平底器的盆、钵、罐、碗等为主,少见或不见三足器和尖底器。其次是彩陶,仰韶文化晚期,在中原地区彩陶虽然普遍衰退,但并非绝迹。在汾河流域中上游的龙山文化早期遗存中,也还普遍存在着,不过已不象仰韶时期发达兴盛了。陶质变软,火候不高易碎,色泽已呈砖红色,纹饰简单,多见平行线纹和勾纹、方格纹等。与仰韶彩陶相比较,无论在那方面都确有逊色。这里的早期龙山和晚期仰韶文化发展关系是很密切的。

中期遗存和晚期遗存,其文化面貌,明显是晋中龙山文化类型早期文化的发展和继续。从器物群的多少有无及其分布,我们可以看出晋中龙山文化类型的发展趋势,大概是由东向西北发展演化的。其经济生活是农业、狩猎并举。由于文化类型的不同,我们可以推断汾河流域中上游和吕梁山一线及以北地区,与中原当是一个不同的族系。这个族系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属狄族及其先世。

(3)晋南(塔儿山)龙山文化类型。这个类型的龙山文化,主要分布于晋南临汾盆地塔儿山周围地区。根据目前的资料,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襄汾陶寺、翼城天马、苇沟、南石和曲沃东许与曲村等处。文化遗存也有着明显的早晚发展关系。

早期遗存。这里我们仅以陶寺为代表加以说明。这个遗址自70年代末发现以来，在遗迹方面，发现有窑洞式“吕”字双室和单室的房子，烧制陶器的陶窑以及袋形、圆形和不规则窑穴灰坑多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发现了我国迄今最早的水井。生产工具为石质和骨质，器形的种类均为龙山文化时期习见的斧、镑、刀、铲等，还发现有长达30~40厘米细长的石钺、半圆形“耜”形器和曲尺形石刀，但不见细石器。出土的生活用具多为陶器，陶质很复杂，有灰、褐、黄、红、黑等。发现的彩陶少见烧制，而多为陶器烧成后，花纹才绘上去的。其色彩多样，有红、黄、蓝、白、绿、黑等几种，纹饰多雷纹、勾纹或其它几何图案。画技纯熟，颜色鲜艳。陶器的器形，早期多平底器，但出现了三足的扁足瓮。种类除有釜、灶、细颈壶、大口四耳罐、扁壶等为这一类型陶器中具有类型特点的器物外，其余盆、钵、碗、深腹罐多为龙山文化所习见的器形。

中期遗存。根据发掘资料，这个类型的中期文化遗存，无论是石器、骨器，还是陶器，大体上是这个文化类型早期的继续。但在陶器的种类上又多见有甗和鬲等炊具，较晚些时候又有了陶鬲。

晚期遗存。晋南龙山文化类型的晚期遗存，在陶寺遗址中是极为丰富的。它是这里早中期的继续。其文化特征，在建筑遗存方面，除一般地穴居址外，习见石灰面房子，形式多为圆角的方形，在丁村还曾发现在石灰居住面下又加一层夯土垫基的建筑形式。在生产工具上，出土的石、骨器，种类大体同早、中期。也发现不少蚌器。石耜和铜器的出现，标志着晋南龙山文化发展有了一个大飞跃，这是其它类型的龙山文化所不及的。生活用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丰富。日常用具虽仍以陶器为大宗，但已普遍使用了木器和漆器。木漆器的品种较多，计有俎、盘、匣、豆和“仓形器”等。在这些木漆器上，往往彩绘着各式各样的图案。这些精美器物的出现绝非偶然，除表明陶寺龙山文化生产水平的发展与进步外，也还有它的历史意义，即揭示出晋南龙山文化类型晚期社会性质的变更。

体现社会变更的生动资料，是陶寺龙山文化的墓葬，其面积达三万多平方米。由发掘的上千座墓葬来看，其形制有大、中、小三种。葬具和随葬品，前者有棺，并有种类繁多的殉葬品，数量多者有达200余件的。而一般的小墓随葬品极少，有的竟一贫如洗。这是表现当时社会贫富分化的实例。此外，在一些大墓中还埋葬着显示财富的猪头和体现死者显要身份的龙盘、石磬、鼓、玉琮、玉斧等礼器。在这些礼器中最有意义的是龙盘，它不仅显示出墓主人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且还反映出晋南晚期龙山文化的图腾信仰和部落联盟，有力地说明当时的社会性质的变更，即氏族社会行将崩溃，国家即将产生。

据历史记载，山西晋南素有“夏墟”之称，而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尤其是它的晚期，无论是时间与空间序列，都恰恰在夏纪年和夏族活动故地的“夏墟”之内。陶寺遗址中的水井和遗物中那些彩绘的木漆器，前者据历史记载为商时伯益所发明，后者与文献所说“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画其内”的史实相吻合。同时，墓地和遗址规模的宏大，表明居住或占有者显然非一般氏族人员，而很可能为部落首领或“王”者所居或占有。因此陶寺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对于探索夏族及其文化的起源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4) 晋西南类型。这一类型的龙山文化内涵较为清楚，分布地域主要是在运城盆地

周围和中条山南北麓直到黄河北岸。这一地区的文化遗址非常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有夏县的崔家河和东下冯遗址等多处。

东下冯遗址属庙底沟二期文化。发现的建筑遗迹多见地穴式的圆形房子和圆形的袋状灰坑。出土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种类有磨制的斧、铲、铤和打制的盘状器和砍刮器等。此外出土的大型厚重石铲和石耜尤具特色。生活用品以陶器为大宗，陶质很复杂，有灰、黑、白、红、褐粗细质地几种陶系。彩陶较少。纹饰多绳纹。器形有盆、钵、罐和少数鼎、甗，还有尖底瓶和筒形器。而后者的两种陶器在上述各类型的龙山文化中还是少有的。装饰品中的陶环，与晋中类型相比，这里出土的数量很少，形制亦很单纯。

中期遗存是这个类型早期文化的继续。晚期遗存，就其文化性质，大体上均与河南陕县三里桥龙山文化相似。具有代表的遗址有芮城南礼教、东王村和夏县东下冯晚期龙山文化等。这里以东下冯遗址为例，发现的建筑遗迹，多石灰面房子，形式有圆角方形和圆形的两种，居住面距地表不深，大体均属地面建筑形式。室内布局都有圆或方形的火塘烧坑。其中一座石灰面房子用扁平河卵石作明础，这一建筑形式是迄今各类型的龙山文化中都是少见的。此外也还发现一类不用石灰做居住面的地穴式房子、东下冯晚期龙山文化的建筑遗存中，曾出土几十公斤烧成的石灰，从而冰释了长期以来人们对龙山文化中普遍使用石灰做居住面的房子，而不知其原料是什么，皆统称其为白灰面之继。生产工具以石、骨质的为主，石器的种类有斧、铤、铲、凿等，均为龙山文化中常见的生产工具。但有较多的蚌器，如刀、锯等的发现。生活用品仍以陶器为大宗，陶质仍是细泥灰陶和夹砂灰陶较多，亦多见绳纹。器形有鬲、甗、甗、甗等炊器、陶鼎少见，然而多见单把鬲。盛器有大型扁足瓮、直口瓮和罐等，次有盂、豆、双腹盆、单耳杯、双耳杯等，且数量较多。这是晋西南晚期龙山文化类型的特点。除这些陶器外还发现一种陶胎很厚直腹圆底的锅形器，亦为其它类型所少见。至于晋西南龙山文化类型的墓葬，在东下冯曾发现二十余座，形制有土圹墓和无圹墓两种，皆无葬具，随葬品也极少。同时还发现与祭祀有关的埋葬人和羊的圆形埋葬坑，从而丰富的晋南龙山文化类型的文化内容。

(5) 晋东南龙山文化遗存。由于过去我们在这个地区做的工作不多，对其文化内涵的了解是很不够的。但在一些调查中亦略管窥其文化梗概。其文化面貌和性质，大体与晋西南一致，或者说它的早期又更接近于河南庙底沟二期文化。

以上我们简略论述了有关山西龙山文化各类型的情况。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山西龙山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它的演变发展关系等问题，历来考古学界论述不多。其来源，我们认为当起源于这个地区晚期的仰韶文化，并为山西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所继承。至于山西龙山文化的年代即它的上下限，如果以陶器群中三足器陶甗的出现为标准，其时应为这里龙山文化的早期。那么在这以前，未出现甗的所谓龙山文化，仍可视为晚期仰韶文化或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在这以后伴随着鬲的出现，其时可属于龙山文化的中期。而这以后陶甗和蛋形三足瓮的产生，则可视为龙山文化的晚期。所以，从三足器的发展、由甗而鬲、甗、瓮的演变或交替，在考古学上，便是山西龙山文化的发展序列和年代关系的标尺。从而我们就可以看到山西龙山文化的发展趋势，虽有类型之分，但

发展的尺度大体是平行的，序列和年代早晚也大体一致。

在生产方式经济部门上，尽管山西龙山文化有着区系类型之分，然而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大体上大同小异，即前者潞沁河、晋中类型，多半是以狩猎、畜牧为主而兼营农业；后者晋南和晋西南类型，则多半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和畜牧业。但这几个龙山文化类型的经济都缺乏渔猎生产部门。而绝对的单一的经济生活，可以说在山西各类型的龙山文化中都是不存在的。

关于山西龙山文化人们的共同体问题，由于这里的龙山文化有类型之分，而人们的经济生活或生产部门又有一定的差异，从而便反映出人们的共同体并不单纯属于一个族或一个谱系。据此，我们可以说潞沁河和晋中两个类型，可能是代表我国北方一个大的族类，这个族系则当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属于狄（翟）族及其先世。而晋南和晋西南二型，似可视为中原华夏族或其支系的先世。

（三）二里头文化阶段

依据历史记载，夏族的起源和发展，就其时空关系，夏文化的早期活动地域很有可能是在晋南，即霍山、太行山以南地区、今之襄汾塔儿山（古之崇山）周围的龙山文化（尤其是晚期）可能就是夏族早期或先夏文化，而夏县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即是它的一个发展阶段。因此，我们说目前探索夏文化，特别是探索夏族早期起源时代的文化，当以晋南地区的龙山文化为其主要对象和地区，而夏代的中期文化，则应为河南伊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

山西夏纪年时期的文化遗址，属夏早期或者为其夏族部落联盟阶段的文化遗存，我们上篇论述晋南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时业已谈及，此不再赘。这里仅介绍山西二里头阶段的文化。这一阶段的文化遗址，从六十年代以来，据我们调查所掌握的材料，无论是数量、分布和文化内涵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变化与发展，在数量上当不下百处，估计不亚于河南、其分布情况已不仅仅局限于晋南一隅，北界已达忻州地区，东南接近太行山西麓，西、南两面濒临黄河，而且大多数遗址也恰在龙山文化区类型的范围内，其中许多与早于它的龙山和晚于它的二里头期商文化及殷周文化共存，往往不是叠压龙山文化就是为商文化所叠压。其文化面貌又多与河南二里头文化有所不同，有其自身特点和类型上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文化不同类型的分布及其特征又多与龙山文化类型分布相同，并同所在龙山文化和商文化有着一定的上下发展关系。但由于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以往做得不多，其资料多来自于调查，对二里头文化阶段各类型遗址的发掘及详尽了解其文化内容，进而给予研究都是很不够的。对山西二里头阶段文化类型的划分，目前我们仅划分晋中和晋南二个类型，而晋南类型也可一分为二，其它的二里头文化类型，因资料不足，现在对其类型的划分还为时过早，这里我们只介绍晋南和晋中类型的情况。

1. 晋南类型。

这一类型的二里头阶段文化，以往做的工作较多，在涑水、汾河、浹河流域共发现35处，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有东下冯、感军、苇沟、东马铺头等。这里我们仅以夏县东下冯遗址为例。

东下冯遗址位于夏县东下冯村北的青龙河两岸台地上，总面积约二十五万平方米。此遗址遗存丰富，种类很多，主要有；

建筑遗存。发现一座，分里外两圈的“壕沟”，两沟平面呈梯状“回”字形。形态规整。里沟长约130米，宽为5~6米，外沟长约150米，宽为2.8~4米，深度均在3米左右。在沟内填土中曾发现不少夯土堆积。夯土有的成层倾斜，有的零散。我们说它无论是沟或城堡遗存，都可视为当时的防卫工程的遗迹。

其次发现水井两眼，形制相同，平面长方形，长1.27、宽0.9米，深在5米以下。结构规整，井壁还凿有供人上下的脚窝。井底有无木构井、座盘架设施，已无法查知了。

居住址、共发现三十多处。形制有地面建筑、半地穴和窑洞式三种，其中数量最多的属后者。这类窑洞住宅简单，多选择在断崖沟壁，对崖或壁略加修整向里挖掘而成。其平面形制有圆、椭圆或圆角方形三种，室内面积均不大，一般约4平方米，门洞低短，洞顶穹状，壁有小龛和大膛。

灰坑或窑穴，发现百余座，有圆形袋状、圆形锅底、蚕茧状和不规则等几种，有台阶可供上下，为当时一种储藏窑穴。

陶窑、三座，均就断崖掏成，窑体不大，由圆形窑室和盆形大膛组成，顶拱状，窑底设方、圆火道口，形制规整。

墓葬、共发现11座，分土扩竖穴和无墓穴两种，竖穴墓的形式有单人和双人葬，单人葬皆仰身直肢，双人葬发现一座，随葬品较少，一般为一至四件陶器。无墓穴者，均为灰坑中埋葬人的丛葬坑，表明死者社会地位低下而被遗弃，此或为与祭祀有关的人祭遗迹。

精神遗物，主要有卜骨，为数不多，均系羊、猪的肩胛骨、刻卜方法，为不钻不凿，直接烧灼，此外还发现一件打制的长60厘米的石磬，磬体硕大无比，较为完整，击之声音清脆悦耳。这种乐器当源于这个地区的龙山文化，为邻近诸省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所不备。

生产工具，青铜器数量较多，主要有铜铍、锋凿、锋刃器和铸造青铜斧的石范、石骨器还占有重要地位，种类仍是斧、镑、铲、刀、镰等。

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陶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大宗，褐陶次之，磨光黑陶少。一般火候不高，往往易碎脱皮。制法多采用轮制。纹饰多见绳纹或杂乱绳纹和贴边压纹，篮纹和方格纹极少见。器形复杂，炊器主要是鬲、甗、甗、罐；盛器有盆、甗、豆、甗、甗、杯等；大型容器有蛋形三足瓮、敛口瓮、大口尊等，在器物群或其组合上，这一类型的早期陶器多见鬲、甗、甗、少鼎、浅盘细柄喇叭形豆和圆底（内凹）花边或贴边罐是这里具有特点的陶器、甗、甗的身与袋足的比例不等分，鬲的形制多见单耳和实足肥腿鬲，蛋形三足瓮器体肥硕，多敛口，袋足低矮紧贴于瓮底中心部位，这一陶器在这里发现不多，表明这里是蛋形三足瓮分布地区的南部边缘地带。

2. 晋中类型。

这种类型的二里头阶段文化，主要分布在汾河流域中、上游晋中一带，并由此往西到吕梁山沿线，或其向壮以至内蒙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和墓地有太原东太堡、狄村、许坦、郑村、光社、太谷白燕、郭堡、汾阳峪道河、北垣底、孝义薛家会、娄烦何家庄等处，就其文化面貌看，大体上一致，上下发展关系也比较明确，有着明显的早晚

演变与发展序列。

早期遗存可以太原东太堡、许坦、汾阳北垣底为典型。

建筑遗存。多为圆形或袋状灰坑和窑穴。

墓葬。发现较多，分土坑竖穴和石棺墓两种，前者无葬具，葬式皆仰身直肢单人葬；后者的墓室系石块叠压或用石片砌成，上面以石片覆盖，葬式多系仰身直肢单人葬。两种墓葬都有随葬品，器物为陶器、石器和骨器，数量不多，此外发现的“石棺”葬，据现有资料，在山西还属首次。

生产工具。以石、骨器为主，石器的形制多为这里龙山文化所不见的斧、镑、刀、镞、铲等。

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陶质以夹砂灰陶、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陶为多，磨光黑陶褐陶较少，一般火候不高，器表有脱皮现象。多轮制、模制。纹饰以杂乱绳纹为主，次有附加堆纹，间有少许浅篮纹，锥制点划纹或刻拍纹是这个类型的特点之一。主要炊器为鬲、甗、甗和鼎盛器多见浅盘细把喇叭形豆及簠、爵、盆和橄榄形或鞍形罐等。具有特色的三足瓮数量较多，并极其普遍，但缺流嘴盃、三足盘和研磨器。由于这一类型中三足器的炊具发达，所以陶器后形制一般都较为复杂。在制法上，鬲足均有实足根，往往足跟与袋足多由卯榫状套合而成。甗和甗的上部形制均属盆形，其比例与晋南不同，一般是盆身高于袋足部分，蛋形三足瓮的形制变化与这里龙山文化相比，袋足普遍变浅，绳纹多饰于其腹部、同时见有篮纹。

中晚期遗址发现较多，当从太谷白燕、郭堡和太原光社等处较有代表性。

建筑遗存，多见圆形半地穴式、洞穴或房子，还发现有白灰面涂层的建筑遗迹。灰坑和窑穴有圆形、袋形和不规则形等。

生产工具、有石斧、有肩石铲、镑和骨铲、骨镞等。铜器很少。

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陶质仍以夹砂灰陶、细泥灰陶为大宗，褐陶次之，火候一般较高。纹饰以杂乱绳纹、锥刺点纹和链条状附加堆纹为多。制法与早期同、器形种类也与早期大体一致。

精神文化，主要是卜骨、骨料多为猪、羊肩胛骨、制卜方法，对骨面仅部分地粗略刮削加工，多直接烧灼，也有钻凿者，但为数不多。

其它我们在太行山西麓南北两端，即北到忻州地区的五台、南迄地区的陵川，都曾发现二里头阶段的文化遗存。但对其文化面貌、内涵、性质等方面作更多的了解尚待进一步发掘，然而它却展示了山西二里头阶段文化分布的广阔和遗存的丰富。

晋南二里头文化类型的源流，其源头主要来自这里晚期的龙山文化。因为我们在东下冯遗址中发现了“东下冯类型”文化层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晚期文化层层之上的地层依据、另在器物群上，东下冯类型早期陶器的鬲、甗、甗在这里的，晚期龙山陶器中都能找到它们的“祖型”。其次从晋南发现的蛋形瓮，亦可寻觅它们的踪迹，而晋南二里头文化的去脉正是东下冯遗址里晚期的文化遗存，即二里岗期的商文化。

晋中二里头文化类型的源流，太原东太堡和汾阳峪道河等处晚期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蛋形三足瓮以及鬲、甗、大口尊等，与当地二里头文化早期同类型器，特别是其中的蛋形瓮有着比较明显的发展关系，这说明它是继承了当地的龙山文化，而其去脉，由

某些遗址中的地层关系及其器物群中的鬲、甗、甗、蛋形三足瓮等陶器看，也正是为这里的二里岗文化所继承。

(四) 殷商文化阶段

山西的二里岗期商文化和殷墟文化在五十年代为人知之者甚少、六十年代以后，前者发现较多，后者在晋南特别在晋西南地区至今还发现不多，现依时代先后特别论述如下：

1. 二里岗期商文化。根据考古发掘与调查表明，二里岗期商文化在晋西南和东部发现较多。其分布范围在抵从黄河北岸中条山沿线的永济、夏县、垣曲、经太行山西麓的长治、长子到晋中榆社、太谷然后到忻州、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永济东马铺头、夏县东下冯、垣曲古城南关、长子白高庙、太谷白燕、忻州张村等、文化内涵复杂，年代有早、中、晚三分。

建筑遗存，发现城址二座，夏县东下冯的圆角方形，南墙长400米，墙宽8米，残高1.8米。垣曲的一座，濒临黄河北岸，平面为弓形四边形，北墙现尚暴露于地面，残高约2~3米，墙东西390米，南北338米，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在东下冯商文化遗址中，尚发现十余座成组的建筑群，研制都为圆形，直径为8.5~10米，中心有一大柱洞，周围有二、三十个柱洞不等、台基平面上还有四条呈“十”字形埋柱的基槽，将圆形平面分隔成四个扇形部分，建筑的形制结构特别。在其它二里岗文化中还发现有大型夯土建筑遗迹和地穴或半地穴的房子。

水井在东下冯商文化层中发现两眼，平面呈长方形，形制特点与东下冯（夏）文化类型的、水井相似，灰坑多为圆形，窑穴一般较规整，在东下冯发现的几座皆为圆形，直径6米，深4米，平底直壁。

墓葬、二里岗期的墓葬发现不多，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品一般不多，有铜爵、陶豆、甗、盆、玉片等。此外，亦有无墓圻随意弃置掩埋在灰坑、灰层中的人骨架。

精神文化。卜骨较多，除少许羊骨外，多见肩胛骨，并多加工，有钻有凿，烧灼痕清楚。

生产工具。有铜刀，最多的还是石、骨的刀、斧、铲、镰等。

生活用品。我国古代的青铜器，在二里岗时期，已普遍用作生活上的容器，山西出土情况大体如此，但数量不多，发现的有爵、甗、鼎。陶、骨器仍为大宗。陶器多细泥灰陶和夹砂陶，轮制，纹饰以绳纹为主，弦纹、附加堆纹和“S”纹次之，器形有鬲、甗、甗、尊、大口尊、甗、蛋形三足瓮、敛口瓮、缸、盆、钵、豆、罐等，种类复杂、骨器也极丰富，有锥、针等。这表明二里岗期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文化面貌。从陶器群看，山西的二里岗文化与河南商文化既有它们相同的地方，但也有地域类型和自身的特点。例如河南二里岗期的陶鬲，形制特征为许曲唇、短颈、连裆、实足根成羊角形；而这里除此之外，尚有土著形的花边、长颈、乳头状袋足或器身稍长的筒形鬲，有的通体饰绳纹。同时，富有地域、时代和文化特征的蛋形三足瓮，在河南二里岗期的商文化从未发现，而在山西却是当时人们普遍使用的大型盛器，由于器

物群的不同,可见晋南二里岗期与汾河中游晋中一带人们为一共同体,与河南显然不是属于一个族类或谱系,至少是不同的分支。

2. 殷墟文化阶段。

山西境内的殷墟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太行山西侧的晋东南、晋中、忻州地区,并由此往西经吕梁山沿黄河直至石楼和保德等地。总的来说在本省北部分布较广。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和墓葬,有忻州莲寺沟、太谷白燕、汾阳杏花村、柳林高红、石楼二郎坡和桃花庄、永和下辛角、保德林遮峪、赵城上院、灵石旌介等多处,虽遗址发掘不多,但墓葬发现不少,故对这一阶段的文化特点和性质还是清楚的。

建筑遗迹。其住宅、灰坑、窑穴等,大抵与二里岗期相同。

生产工具。有铜器斧、斤、铲等,更多的则是陶、石、骨器如斧、刀、铲、镰等。

生活用具。铜器鬲、甗、罍、觚、爵等皆见,但多属上层贵族,而一般居民仍然以陶器为主。陶质多灰陶,次有少量的白陶及磨光黑陶等。器形仍不超出二里岗期的陶器种类,不过形制皆有发展和变化。

精神文化。多见卜骨。多用牛肩胛骨。制卜方法,都经修整和刮削加工,有钻有凿,烧灼痕迹清楚。

墓葬。经发掘的有灵石旌介和太谷白燕、旌介发掘有三座墓葬,均长方形土圻竖穴墓。葬具棺槨兼备、仰身直肢葬。其中两座有殉人,察其位置当属墓主之妻妾或亲近的奴隶。随葬器物丰富,共二百余件,而铜器竟多达138件,次有玉器和两件陶鬲。铜器有鼎、罍、戈、矛、镞、弓形器等。在其二十余件铜器上铸有“𠂔”形的铭文或族徽标志。灵石这批墓葬的发现在学术上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批青铜器的形制具有殷墟文化的某些特征;但其地域性亦是很明显的,如羊首刀(剑)等,为殷墟文化所不见,而是具有北方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和特征,这表明两者是属不同文化谱系的。灵石青铜文化的族属问题,显而易见可能为殷时某一方国的部族遗存,由其中铜器铭文“鬲”族徽的大量出现,表明其族可能为夏商时的“有鬲氏”。如是,则灵石发现的墓葬的意义,无论对历史学、考古学都是很重要的。

此外,以往在保德、永和、石楼和柳林等地曾发现一大批青铜器、玉器和金器。其中,青铜容器除与河南殷墟文化具有相同的因素外,尚有觥、盃、竖耳尊、铃首或蛇首刀、剑、匕以及螺形金耳饰等,同样也都明显地具有北方青铜文化因素和浓厚的地域特征。对此我们根据甲骨文记载,殷时的“土方”和布币文的“土匀”以及地名学中汉时的土均郡,据我们勘察研究认为,就在今孝义、石楼一带地区。而这批铜器正在甲骨文所记载“土方”活动区域,其空短和时间又如此吻合,从而我们推断今崇山和吕梁山一线地区,当是殷时“土方”等部族方国活动之所在。

(五) 西周与东周遗址

1. 西周文化遗址。西周文化在本省主要分布在晋南地区,代表性的遗址和墓葬有翼城天马、曲沃曲村、洪洞坊堆和永凝堡以及临猗师家村等地。

建筑遗迹多见灰坑与窑穴。生产工具除铜器外,一般仍以石器和骨器为主。生活用具以陶器为最多,陶质均系灰陶,以绳纹为主,器形有鬲、鼎、罐、甗、簋、豆、孟、盆以及大口三足瓮和蛋形瓮。另在坊堆曾发现一件带字的卜骨。